

周川 黄旭 主编

百年之功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
教育家精神



周川 黄旭 主编

百年之功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新登字02号

百年之功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

周川 黄旭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27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六印路30号 邮编350011)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25印张 410千字 4插页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334-1410-1/G·1062

定价: 14.00元(平)
19.50元(精)

序

潘 懋 元

本书收录了50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评述了他们的办学业绩、教育思想以及他们的品格特征。

书名冠以“百年之功”，其含义：一是书中所收录的大学校长主要活动于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之间，即使有一些校长的办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本书所记载的也仅限于1949年以前的事迹。二是大学校长所从事的是“百年树人”的宏伟事业，在他们执掌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批高级人才，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与文化发展与变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时至今日，活跃于社会各领域的许多老一辈的栋梁之材，大多是那个时代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何况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影响到我们的今天而且还将惠及我们的后代。因此，说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从事的事业“功在百年”，是不为过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西汉有“太学”，晋代有“国子学”，唐代有“六学二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古代具有某些高等教育特点的学校。但是，真正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分科类传授高深而专门的科学与文化知识的高等学校，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当时，中国先进的人物，面对着内忧外患，认识到了在当时顺应世界潮流振兴图强之道，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于是，以学习西语、西艺、西政、西学为主要目的的高等学校也就应运而生。1862年

创办了京师同文馆，1895年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1898年创办了京师大学堂。随着国内外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清末民初之际，创办新大学成了一种颇为时髦的举动，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批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大学校长的“近代”一词，不只是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教育人物，而且包含着这个群体的基本政治属性——新兴资产阶级教育家。“近代”一词，把他们与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范畴的“古代”教育家以及与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现代”大学校长区分开来，同时也指明了他们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作为开拓者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他们中的大多数生长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走向崩溃、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兴起的社会大动荡时期，目睹清朝统治下的腐败和感受革命的澎湃浪潮；他们大都曾留学海外，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心怀不满与痛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有着热情的憧憬。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早期都有过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经历。反映在他们的办学上，大多数反对尊孔读经、封建礼教，主张教育独立，倡导实利主义教育，提倡科学民主，思想自由，要求发展“活泼的个人”、培养“完全之人格”。这些主张与资产阶级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

当然，这个大学校长群体是很复杂的，从个人经历看，原先他们有的从政、有的从军、有的从商，更多的则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后来他们在政治上有的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有的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有的转向了共产主义阵营。但是，他们在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大多是以科学、民主和爱国主义精神办学，集中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救国”的信念与理想。他们

企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工作，培植新人、开启民智，以拯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行不通，但他们的良好愿望，却是他们对教育事业怀有无限忠诚和做出重要贡献的精神支柱。正是靠着“教育救国”的这种理想，他们有的节衣缩食，惨淡经营，排除外界干扰，矢志不渝，于窄缝之中求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有的奔波于动荡的社会和连绵的战火之中，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那样复杂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取得的办学实绩、办学经验和他们所表现的办学精神乃至人格力量，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这既是他们的“教育家精神”之所在，也正是我们今天来研究它的意义之所在。

“论从史出”，高等教育历史是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例如，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离开了大学校长们丰富的、具体的办学经验，只是从一般管理原则推论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从一时的得失论述管理的成败，就很难写出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专著。尤其是涉及到高等教育一些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往往非一时所能看清楚，也不是靠有局限性的实验或实践所能解决，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本书选取了中国近代这一历史时期，选取了大学校长这一教育家群体，记载了他们的办学主张、办学业绩和办学经验，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曲折历程，为我们深入认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丰富而有说服力的线索和证据。“观今宜鉴古”。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我们就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高等教育的今天和明天，也就很难深入理解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走自己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道路。

本书选入的大学校长，大体体现了这样四个特点。第一，以学者出身的为多，许多政治色彩过浓的未收入；第二，任职期间

是以校长为其主要职务的，挂名兼职的校长均未收入；第三，办学上有成就或是富有特色的；虽守业兢兢业业而少成就、无特色者不收；第四，任职时间较长的。当然，符合上述特点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远远不止本书收录的这些，有些甚至还是相当突出的，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李蒸、北京农业大学许璇、交通大学的凌鸿勋、圣约翰大学的涂羽卿等等，本书未能收入，想必是篇幅所限，或者是由于查找资料的困难。

本书目录按照校长就职先后为序排列，颇用心。通阅全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貌，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此外，每篇附录的校长“教育言论要目”，为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少便利。

本书的作者都是高等教育学领域的青年人，其中有几位曾是我的学生。他们出于“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做一点实证性、资料性工作”的愿望，选定了本书这样一个课题，是很有眼光的。两位主编在酝酿本书收入人物、编写提纲及写作的过程中多次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他们的这个计划，始终是鼓励和支持的。

作者们大量查阅了校长本人的著作、传记以及有关学校的校史档案，也旁稽参校了校长亲朋、故旧和学生的回忆及纪念文章，推情酌理、评价公允，是可以当作信史来读的。当然，个别篇幅由于侧重点的不同，或者是由于资料的不足，叙述不够细致深入，稍嫌简略，这是需要通过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或者是在再版时加以改进的。

1993年4月于厦门大学

目 录

1	马相伯	(1)
2	唐文治	(14)
3	陈宝泉	(29)
4	严 复	(37)
5	蒋百里	(46)
6	刘海粟	(56)
7	李登辉	(67)
8	蔡元培	(79)
9	陈 时	(98)
10	郑辟疆	(109)
11	郭秉文	(120)
12	张伯苓	(137)
13	吴玉章	(152)
14	许寿裳	(163)
15	蒋梦麟	(170)
16	邹 鲁	(181)
17	马君武	(191)
18	刘仙洲	(202)

19	钟荣光	(210)
20	张寿镛	(219)
21	张 澍	(225)
22	陈 垣	(239)
23	郑洪年	(248)
24	陈裕光	(258)
25	胡 适	(270)
26	刘湛恩	(287)
27	吴贻芳	(295)
28	罗家伦	(306)
29	茅以升	(320)
30	胡庶华	(330)
31	肖友梅	(340)
32	许崇清	(349)
33	梅贻琦	(358)
34	王星拱	(371)
35	陆志韦	(382)
36	任鸿隽	(388)
37	何炳松	(402)
38	竺可桢	(411)
39	林砺儒	(423)
40	萨本栋	(431)
41	潘序伦	(438)
42	熊庆来	(448)
43	张孝骞	(458)
44	廖世承	(464)
45	雷沛鸿	(477)

46	田培林·····	(488)
47	吴有训·····	(495)
48	周鲠生·····	(509)
49	徐悲鸿·····	(518)
50	傅斯年·····	(526)
后	记·····	(536)

马 相 伯

1903—1913：震旦公学校长
复旦公学校长

马相伯，原名志德，字斯臧，改名良，字相伯，亦作湘伯、乡伯，晚号华封老人，世奉天主教，教名若瑟，故又名若石。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后裔。1840年4月17日生于江苏丹徒，1939年11月4日卒于云南凉山，享年百岁。

马相伯5岁入塾读书，12岁时只身到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之前身）学习神学和西方科学，毕业后留校助教国文，31岁时得神学博士学位并被授职神甫，次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著有《度数大全》120卷，因未及时刊印而散失。1873年起投身于洋务，曾任东京中国使馆参赞、神户中国领事，并赴朝鲜襄助新政。1886年至1887年奉李鸿章命游历英、法、德、美、意诸国，考察商务和教育，是为后半生献身教育之契机。

从震旦到复旦

传教、从政都不能使马相伯的救国理想得以实现。于是，他开始认为救国方策便是“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当年游历欧美，颇有创设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之中国新型高等教育以救国之豪气，后因变法失败，政局动荡，自己又年老体衰而做罢，但其兴学育才的念头一直没有息。1900年，马相伯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将祖传遗产——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捐献给天主教耶稣会“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斧资所不及”，^①期待能“托耶稣会团体，以期长久”。

马相伯自幼就读于私塾，对传统教育之弊端深恶痛绝，而教会学校却在某种程度上将他领入了科学的殿堂。所以，当他想兴校办学，又感到“个人之建设，势不能久”时，便自然而然地想依托教会之力量来完成这种心愿。但是，耶稣会接受了财产，却未办学。此时，先有梁启超，后有蔡元培“以求西学必先通其语言文字，而西人教会学校及国人自办之学校，但为蒙童所设……不合成年人求学之用”^②的原因，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后来胡敦复、贝寿同等也参加进来。马相伯受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又目睹许多青年求学无门，毅然以花甲之岁、衰弱多病之体挺身而出，担起了兴学育才以图强国救国的重担，于1903年春创办震旦学院。当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盛赞道：“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③

震旦初创时，一无校舍，二无师资。马相伯凭自己与法国天主

① 《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上海市高教局历史档案第599卷。

② 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中央日报》1938年5月16日。

③ 梁启超：《祝震旦学院之前途》，《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819页。

教会之渊源，借徐家汇天文台之余屋为校舍，又以私谊，聘数位耶稣会教士义务任教，教习各国语言。马相伯自任校长。虽然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教会的力量，但从办学动机到办学宗旨，马相伯均明确是为中国培养传播西学的人才而不是为教会培养信徒。他说：“慨自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入手工夫则文字尚无。……故设震旦。……无他，为科学等根本故。”^①他毅然宣布了三条办学信条：“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②入院学生远至川、滇、晋、陕，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贝寿同、项微尘、马君武等均为当时学生。

（由此可见，不少教育史上，将1903年创办的震旦学院称为法国天主教会所办之教会学校，有失恰当。）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某些人见震旦学院声誉日著，阴谋夺取震旦学院的领导权。他们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任命法国神父南从周管理学校。“南公尽改旧章”，加强宗教宣传，企图改变学校性质，把学校变成法国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教会学校，“学生抗不从命”，全体学生集体退学。132名学生中签名退学者达130人。马相伯毅然支持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辞职离校。震旦学生的退学行动，是为抵制外国传教士的侵夺，捍卫国家教育主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创举。至此，马相伯想依靠教会的力量办中国新型大学，培养新型人才以强国救国的幻想破灭了。

震旦学院停办后不久，马相伯即召集离校学生商议复校办法，推定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等人协助他筹办复校事宜。社会各界人士对震旦师生深表同情，通过各种途径给予援助。两江

① 《马相伯先生笔录》，《复旦大学志》第一卷，第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马相伯、王瑞霖：《一日一谈》，第77页，复兴书局1936年版。

总督南洋大臣周馥将吴淞提镇行辕借给他们做临时校舍，并拨发一万两银子做为学校开办经费。他们还聘社会名流严复、曾铸、萨镇冰、熊季廉、袁观澜、狄葆贤等28人为校董，协助募集学校基金，共同管理学校。在由严复领衔的《复旦公学募捐公启》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以中国处今日时势，有所谓生死问题者，其惟兴学乎。问吾种之何由强立？曰惟兴学问。民生之何以发舒，曰惟兴学问。”^①教育救国之观念更为坚定突出。为与法国天主教会盗用震旦之名的卑劣行径针锋相对，登报宣称“更名复旦公学”。复旦者，隐含恢复震旦之情，又具复兴中华之意，是一个迫不得已又寓意深远的命名。1905年9月14日（阴历八月十六日），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熊季廉、袁观澜诸先生及全体学生的努力下，正式开学。马相伯被公推为第一任校长。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如张大椿、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等。

辛亥革命后，复旦由公立转为私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学院，拟建成哲理、文学、政治、象数、理化各科大学。马相伯感叹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②此即复旦大学之前身。今天，复旦大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东南学府之重镇，并以其治学严谨、学科齐全、师资雄厚而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中心，这与当时的创始人不懈奋斗、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没有马相伯，就没有今日之复旦大学。

做为一个教育事业家，马相伯除创办震旦、复旦外，还协助英敛之先生共同筹划创建了辅仁学社（即辅仁大学之前身），并

① 《复旦大学志》，第51页。

② 《复旦公学始业式志盛》，《民主报》1912年5月11日。

曾任北大代校长。他还捐办启明、静宜、培根等女校，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振兴竭尽心力。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这句话是马相伯1907年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集中反映了马相伯办学的指导思想。马相伯虽然信奉天主教，可是他对于某些外国传教士利用帝国主义特权，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十分愤慨。他站在维护祖国利益的立场上，明确地提出：办学、读书，是为了救国，而救国又必须办学、读书，传播和学习科学知识。这就比较正确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问题。

马相伯曾经说：“我幼时便因国家忧患而感受痛苦。记得法文通史课本中，有对我国所下评语，讥刺我们这种民族，是无功来呼吸天地间的空气。”这种刺激，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屈辱的记忆。当他从徐汇公学毕业，法国领事署来聘他做法文秘书时，他断然拒绝道：“我学法语，为中国用的！”这种爱国报国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思想的成熟，以及对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切的认识，变得更为坚定了。

震旦初创时，正值民国前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呼声日益高涨之际，马相伯慨然宣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①把学院定名为“震旦”，“盖兼取东方光明及前途无量之

^①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于右任先生年谱》，台北国史馆等，1978年版，第89页。

意焉。”^①爱国之情，救国之心皆溢于言表。学院成立后，广收“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源于为反抗封建压迫而退学的南洋公学学生及解散了的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因此学生中的爱国精神和民主意识特别强烈。学院院章上规定：“教师上课，不谈宗教；学生在院，不谈政治。”^②前者严格执行，后者形同虚设。马相伯不仅对当时在校学生中的著名革命党人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等人十分爱护、器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主动将因诗稿《半哭半笑楼》讥讽时政、倡言革命而被清廷通缉逃到上海的青年举人于右任招入震旦，以“刘学裕”之化名注册并特免其学费。当于右任表示恐累及学院及马相伯本人时，马相伯坦然道：“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当时的震旦，马相伯为救国而办学教书，学生为救国而学习读书。后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全体罢学离校，虽属创举，实非偶然。复旦成立后，校园内更是革命精神弥漫。同学多富于革命精神，关心时事，每周的中文作文，较多论及当时时局政治、实业问题。于右任在办民呼、民吁报时，往往择其优秀者，作为该报社论发表。读书与救国，成为复旦师生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两大大责任。当时舆论认为复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

但是，马相伯不赞同学生以社会活动为唯一任务，以社会活动代替学习。他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只有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做到“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的福利”^③。为防止学生因学习西方科技而崇拜西方文明乃至嫌弃自己还不富强的祖国，做出有失国格、人格的事情，他严肃地

①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94页。

② 《复旦大学志》第一卷，第30页。

③ 《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第14页。

告诫学生：“西人学社名位可受”，因为“学问社会，世界人类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异也”，但是，个人是属于国家民族的，“出处行藏，不能稍事通融”，所以“西国富贵官爵不可受，谄西人而挟图本国之富贵者，更为可耻。前有洋奴，今有汉奸，君子不为也”。^①

求得“真的知识”和“活的学问”

马相伯认为，培养救国兴邦、振兴民族的人才，必须使他们求得“真的知识”和“活的学问。”^②他反对把“读经”作为学校的主要课程。他说，经学完全是空虚的形式，大家中了空虚形式的毒，其流弊之极，便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冬烘头脑，一个是欺饰心理。他认为，“中国今日之危亡，实根因于科学的落后”，而要救国，必先振兴科学；要振兴科学，就必须改造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学习西方文明。他主张“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为我所用，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的福利”。

但是，马相伯不赞成盲目学习西方文化，他办震旦和复旦，都是为了鼓励青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但他绝不视传统文化为敝展，这在当时“滔滔然有蔑视国文之恶风”的环境中可谓一明智的特立独行。在他亲自制订的震旦办学宗旨中，明确规定：“使中国青年不出国门，无须以巨量牺牲之代价远适异邦，即可求得其必需之学术，因而对本国文化更可有明确之认识。”^③震旦学院规定，学生肄业“以本国文学优长者为及格”。1905年制订的《复旦公学章程》中亦规定，如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虽录

① 《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

② 《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第14页。

③ 《私立震旦大学一览》。